

# 中国报告文学新论

##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

ZHONGGUO BAOGAOWENXUE XINLUN

— CONG XINSHIQI DAO XINSHIJI

章罗生 ◎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  
湖南大学出版社图书出版基金资助

# 中国报告文学新论

##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

ZHONGGUO BAOGAOWENXUE XINLUN

—— CONG XINSHIQI DAO XINSHIJI

章罗生 ◎ 著



## 内 容 简 介

论著以新时期以来 30 多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整个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从宏观上多层次、多角度地论述了有关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建构、发展规律、流派团体与代表作家等。其中上编首次以“新五性”、“审美文化复合”与“史传报告文学”等创新概念为重点,试图构建中国“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学”的独立理论体系;中编从“从冲突到融合”、“从两极到中介”与“从一体到多元”等方面,系统地揭示了中国报告文学尤其是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报告文学的发展规律与审美嬗变;下编不但首次提出中国报告文学流派的概念,而且从发展、功能、风格与成就等方面,对各流派进行了全新的理论概括和系统论述。

本书为作者积数十年之功,在多本专著和数十篇论文基础上不断提升、精心结撰的集大成之作。它资料翔实、内容厚重,观点新颖、语言简练,论述周详、结构严谨,不仅是中国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创新之作,而且是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重要成果。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章罗生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10

ISBN 978 - 7 - 5667 - 0186 - 2

I . ①中… II . ①章… III . ①报告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 ①I20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9359 号

---

## 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

ZHONGGUO BAOGAO WENXUE XINLUN——CONG XINSHIQI  
DAO XINSHIJI

---

作 者: 章罗生 著

责任编辑: 肖立生 责任校对: 全 健

特约编辑: 岳凯华 卢付林 杨帆 高丽 责任印制: 陈燕

印 装: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6 开 印张: 45.5 字数: 842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7 - 0186 - 2 / I · 66

定 价: 128.00 元

出 版 人: 雷 鸣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 - 88822559(发行部), 88821594(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 - 88649312(发行部), 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xls@hnu.cn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b>绪 论 报告文学研究与文艺学的创新</b>	001
第一节 关于报告文学研究与“报告文学学”	001
第二节 报告文学研究与当下文学批评	004
第三节 报告文学研究与文论体系“重构”	013
第四节 报告文学研究与百年文学史“重写”	018

## 上 编 理论新探

<b>第一章 报告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b>	031
第一节 整体综述与个案评点	031
第二节 李炳银等的“感悟和随想”	037
第三节 丁晓原与王晖：坚守中的超越	041
第四节 《报告文学论》与《非虚构叙事艺术》	047
第五节 朱子南、章罗生等的“史”论与追求	051
<b>第二章 关于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b>	057
第一节 纪实文学研究的滞后及其原因	057
第二节 文学观念的更新与纪实文学的理论建构	069
第三节 纪实文学的门户清理与分类标准	089
<b>第三章 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及其本质设定</b>	100
第一节 传统“文学性”的发展与深化	102
第二节 现代“文学性”与“新五性”	118
第三节 “文化扩张”、“审美复合”与本质设定	123
<b>第四章 “新五性”：文体特性与价值规范</b>	137
第一节 主体创作的庄严性	137
第二节 题材选择的开拓性	149
第三节 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	157
第四节 文本内涵的学理性	168

第五节 文史兼容的复合性 181

## 中编 发展新论

**第五章 从“旧三性”到“新五性” 193**

第一节 80年代：挑战“旧三性” 194

第二节 90年代：重建“新五性” 197

第三节 新世纪以来：向纵深发展 203

附 论 张正隆、陈启文与阮梅创作的意义 212

**第六章 从冲突到融合 224**

第一节 在新闻、文学与政治之间徘徊 225

第二节 在融突、躁动中痛苦蜕变 229

第三节 在融合、开放中沉稳发展 234

第四节 在发展、新变中深入掘进 240

附 论 “批判—歌颂—融合”的两次循环 246

**第七章 从两极到中介 252**

第一节 新时期前后：从“两极对立”到“激情有余” 253

第二节 90年代：沉静、理性、坚守 257

第三节 新世纪以来：清醒、独立、深沉 262

专 论 胡 平 273

**第八章 从一体到多元 292**

第一节 新时期前后：从形式单一到多元探索 292

第二节 90年代：探索中的多元发展（一） 295

第三节 新世纪以来：探索中的多元发展（二） 300

专 论 王宏甲 314

## 下编 流派新议

**第九章 “哥德巴赫”派——科教报告文学 333**

第一节 发展流变 333

第二节 精神承担 341

第三节 风格特色 352

第四节 成就地位 360

专 论 李鸣生 363

**第十章 “国土热流”派——改革报告文学 390**

第一节 发展流变 390

第二节 题材意义 398

第三节 主导风格 403

第四节 理性特色 409

附 论 《梦之坝》：“三峡”题材与“三峡精神” 414

**第十一章 “社会问题”派——问题报告文学 420**

第一节 形成与发展 420

第二节 风格与特色 430

第三节 成就与局限 440

专 论 赵 瑜 445

**第十二章 “历史反思”派——史传报告文学 470**

第一节 发展与现状 470

第二节 品质与功能 479

第三节 “史诗”风范 489

专 论 邓 贤 496

**第十三章 “文体明星”派——文体报告文学 515**

第一节 发展流变 515

第二节 精神诉求 522

第三节 风格特色 526

附 论 《马家军调查》：创新与超越 535

**第十四章 “人杰宣传”派——英模报告文学 541**

第一节 发展流变 541

第二节 价值功能 545

第三节 叙事策略 558

专 论 何建明 570

**第十五章 “巾帼红颜”派——女性报告文学 595**

第一节 女性报告文学及其发展 595

第二节 题材选择与叙事模式 598

第三节 话语体系与艺术特色 606

专 论 陈祖芬 615

**第十六章 “生态环保”派——生态报告文学 634**

第一节 生态文学与生态报告文学 634

第二节 批判主题 638

第三节 风格特色 644

专 论 徐 刚 657

**附录一 历届中国内地报告文学各类奖项获奖作品目录**

(1977. 01~2012. 08) 672

**附录二 作者主要学术成果与科研业绩 (1986. 01—2012. 09) 697**

参考文献 (以出现先后为序) 702

后记 走自己的路——我的学术追求与人生感悟 709

# 绪 论 | 报告文学研究与文艺学的创新

## 第一节 关于报告文学研究与“报告文学学”

本论著以我国新时期以来 30 多年的历史时段为重点，较全面、系统地综合考察和总结了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发展历程与审美新变，以及对文学理论的普遍意义。其目的、价值和意义在于：通过对报告文学的系统研究呼吁“报告文学学”的建立，并以此促进与推动文艺学的创新（注：黑体为笔者所标，全书同）。当然，所谓“报告文学学”，不是相对于“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那样的一、二级学科，而是相对于“小说学”、“诗歌学”、“戏剧学”、“散文学”那样立足于某一文体，或以某一文体为主要研究对象与范围的门类。虽然这样的“学科”分类并不规范与正统，但却实际存在于学术研究之中。因为，我们有众多历史或长或短、人数或多或少、水平或高或低的以某一文类（如小说、诗歌、散文等）冠名的研究所、研究会和研究中心，尤其是有不少有关“诗论”、“小说美学”、“戏剧美学”、“散文综论”甚至“传记学”<sup>①</sup>之类的研究成果。其中尤以“戏剧学”最为系统、成熟：它除有正统、悠久的研究中心（如南京大学）和戏剧学院（如上海戏剧学院等）外，还是艺术学科中的重要门类。而报告文学，虽然它也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但却是主要关注创作而非重视学术的组织；虽然各地也有“研究会”和“研究所”之类，但却成立时间短、级别低，研究人数少甚至名实不符；尤其是研究队伍不成规模，学术成果不多且整体水平不高，缺乏影响较大的精品力作：不仅没有“报告文学美学”之类，而且有分量的作家论著也微乎其微。而与此理论研究严重落后的事实相反，报告文学创作却不但已有百多年的丰厚积累，而且自新时期以来发展迅猛、持续繁荣，影响广泛、成就显著：不但涌现了众多杰出、优秀的作家作品，而且形成了不少特色鲜明、风格迥异的群体流派。当然，由于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一方面，其创作的有效探索与新鲜经验不能得到及时总结并上升为理论，从而使它缺乏应有的

<sup>①</sup> 如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突出者，当属文体的界定与分类，尤其是与纪实文学的关系问题。而这一点，实际又关系到对文体性质的重新认定以及观念革新与文论“重构”等诸多重要问题。总之，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向我们提出了建立“报告文学学”的问题。

那么，“报告文学学”包括哪些研究内容与具体对象？或者说，它当前有哪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呢？笔者认为，就外部研究而言，它包括文学与政治，作家与时代，报告文学与通俗文学、影视文学、虚构文学的关系，以及中外交流与译介等；就内部研究而言，它包括本体论、发展论、流派论、作家论、创作论与批评论等；就体裁对象而言，除报告文学外，还包括与此紧密相连的传记文学、纪实散文与“特稿”（即发表在《知音》、《家庭》等通俗杂志上的作品）等。而本著则针对报告文学研究基础薄弱的实际，从建构报告文学的独立理论体系出发，运用系统论、叙事学、影响研究、对比研究、文化研究和“历史—美学”等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在本体论、发展论和流派论等方面作一尝试，以期抛砖引玉。

关于本体论，笔者认为，至今为止，学术界未能回答“报告文学是什么”——尤其是未能回答“现在的”报告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传统的“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陈旧、过时，根本不能概括、规范和指导“现在的”报告文学创作实践，而必须与时俱进、代之以符合实践的“新五性”，即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和文史兼容的复合性。这“新五性”不但是其文体特性，也是其价值标准。与此相关，根据文学文化学的观点和当今的创作实际，报告文学是一种典型的“审美文化复合体”。关于发展论，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资料整理、现象评述和进程勾勒的表浅层面，而必须从观念变革、思维模式、文体嬗变与内在冲突等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其深层的内在规律。因此，本课题分别从四个方面——从“旧三性”到“新五性”、从冲突到融合、从两极到中介、从一体到多元——对此进行了尝试，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深入地接近研究对象，发现和揭示其理论新质，并在方法论方面探索新路。

与小说、诗歌、散文等一样，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中也存在流派。不同的是，报告文学至新时期后才“蔚为大观”，取得独立地位，因而也才百花齐放、流派纷呈。但流派的起源和酝酿却大多在新时期以前。与其他文体相比，它的发展流变与社会政治关系更为密切，对社会进程与民族心理的影响更为直接。对报告文学流派的研究，不仅能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与把握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现状、发展走向及其内在规律与文体特性等，而且能促使人们思考和回应报告文学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作家与时代以及“典型”、“人学”等方面对传统文论所提



出的挑战，解决以小说、诗歌等虚构文学为基础而建立的传统文论不能规范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创作实际的现实问题，从而为建构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报告文学美学体系与包括虚构文学和纪实文学在内的整个文论体系而奋斗。因此，对报告文学流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文学流派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由一些在思想倾向、艺术观点、艺术方法、艺术趣味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相近或相似的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结合而成的艺术派别”。它们有的以题材划分，有的以地区名为标志，有的以某个著名艺术家的名字为标志，有的则以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为名称<sup>①</sup>；它“是一个民族的文艺进入成熟发展时期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的文艺繁荣发展的标志之一”<sup>②</sup>；“作为具有共同的审美追求与趋向的作家群体，它的发展与存在，往往可以形成一种总体性的审美趋向，引导与规范一个时期的文学”<sup>③</sup>；该作家群必具的素质，“首先是思想倾向的一致”，“其次是文学观念的相近”，“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文学风格”。<sup>④</sup>中国报告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就是这样。它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尤其是经过新时期以来的激烈冲突与迅猛发展，已呈现出既丰富多彩又健康稳定的状态。笔者认为，至目前为止，可初步认定为流派的有“哥德巴赫”派——科教报告文学、“社会问题”派——问题报告文学、“国土热流”派——改革报告文学、“历史反思”派——史传报告文学、“生态环保”派——生态报告文学、“巾帼红颜”派——女性报告文学、“文体明星”派——文体报告文学和“人杰宣传”派——英模报告文学等。尽管它们形成的时间有长有短，组合的方式或自觉或不自觉，但大多倾向一致、题材相似、风格相近。同时，它们也存在多种流派“并存”的现象，如20世纪80年代的“哥德巴赫”派、“国土热流”派与“社会问题”派等的此起彼伏，20世纪90年代后“历史反思”派与“生态环保”派的异军突起，等等，即是其例。

在整体上，中国报告文学流派呈现出这样一些特征：一是题材比较集中。除“社会问题”派外，“国土热流”派集中于改革题材，“历史反思”派集中于历史题材，“哥德巴赫”派集中于知识分子或科教题材，“人杰宣传”派集中于英模人物，“文体明星”派集中于体育、艺术题材，等等。应该说，这是不同于小说、诗歌、戏剧等“虚构”文学的特殊之处。因为，与“虚构”文学相比，报告文学

① 李衍柱：《文学理论百题·艺术流派》，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88～389页。

② 叶子铭语，见中国青年报文化生活部编：《文学百题·什么是文艺流派》，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5～26页。

③ 钱中文：《文学发展论》（增订本），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27页。

④ 刘安海、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

这种“纪实”文学更重题材的选择，而在艺术手法与表现形式上受到一定限制。**二是结构较松散**。除“社会问题”派与“文体明星”派作家等有较自觉的组织和活动外，其他流派的形成几乎都是不自觉的；除穆青、黄宗英、叶永烈、胡平和苏晓康等少数作家外，大多缺乏明确、系统的理论主张。**三是各流派的作家存在交叉、重叠和变换现象**。如黄宗英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有《特别姑娘》、《小丫扛大旗》和《新泮伯》等，应属于“人杰宣传”派，新时期的《大雁情》、《小木屋》和《橘》等创作，因题材与风格的变化则又属于“哥德巴赫”派。同样，根据其创作变化，叶永烈20世纪80年代主要属于“文体明星”派，20世纪90年代后则主要属于“历史反思”派；钱钢、胡平、张胜友等既属“社会问题”派，又属“历史反思”派；理由、陈祖芬、肖复兴既属“哥德巴赫”派，又属“文体明星”派，甚至还属“国土热流”和“人杰宣传”派；赵瑜也是“问题”、“史传”和“文体”兼而有之。还有，如“生态环保”因20世纪80年代还未成“派”，只能归入“社会问题”，而至世纪之交，随着它的发展壮大，则可单独作为流派研究；女性报告文学等因划分标准和侧重点不同，也必然带来交叉与重叠现象。这些，一方面说明报告文学创作与流派的丰富、复杂与多变，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研究和认定流派带来一定困难。因此，必须承认，现有流派的认定与归纳，在一定程度上是为阐释与研究的需要而较多依赖于题材类型的。我们在研究报告文学流派时，必须分清主次、把握特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时，也须持开放、宽容的态度，而不必求全责备。

总之，经过一百多年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壮大，中国报告文学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它和传记文学等纪实文学一道，已构成了与虚构文学双峰并峙的两大系统之一；对其进行发展论、流派论与本体论等方面全面、系统研究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必须在整体把握中国报告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巨大“存在”的基础上，认真、扎实地展开对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全面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学”。

## 第二节 报告文学研究与当下文学批评

报告文学研究——或者说，“报告文学学”的建立对于文艺学的创新有何意义？众所周知，文艺学的内容和对象包括文学的基本原理、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与鉴赏等。我认为，“报告文学学”的建立尤其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研究，对于文艺学的创新尤其是对具有中国特色文论体系的建构，具有非同一般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无论是对文学批评，还是对文学原理与文学史研究，都是如此。

首先看它对当下文学批评的意义。在当下文学批评中，有两个紧密相关的热点问题曾引起热烈讨论和争鸣，且至今“风韵犹存”：一是“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二是“如何评价新世纪文学”——实际上，“新世纪文学”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两者是一个问题，只不过在有些论者那里，其“当代文学”至少未包括“新世纪文学”。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对报告文学研究尤其是对“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报告文学的评价（包括其成就、贡献与地位、意义等），关系密切、意义重大。

关于“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问题，一般认为是由所谓“垃圾论风波”引起的，实际上，在“垃圾论”之前，就有所谓“思想界”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激烈抨击。即有人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因而怀疑小说家等文人“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sup>①</sup>不过，此文的影响有限，真正引起论争与“风波”的，的确还是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所谓“垃圾论”。据“百度·谷歌”网有关“顾彬”词条介绍：2006年11月26日，顾彬接受德国记者采访，就有关中国当代文学谈了他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意见。后被重庆晨报局部转载，顾彬的意见变成了“德国汉学家炮轰中国文学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并被中国内地各大媒体转载，引起很大反应。顾彬知道后，马上给德国中文媒体发电邮澄清，说重庆报纸歪曲了他的话，因为他只说过棉棉、虹影、卫慧等人的作品是“垃圾”，而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没有这样说。不过，后来他又说过：中国当代小说是通俗文学；中国作家只会一条腿走路，中国当代小说家应该沉默二三十年；余华、格非、苏童、莫言等“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中国1949年前的现代文学是五粮液，1949年后的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等等。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顾彬即使未说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是“垃圾”，但也的确包含着类似意思。顾彬的这些言论后被内地媒体以“垃圾论”概括进行炒作，引起了关于“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论战：先是杨义提出“为当今文学洗个脸”<sup>②</sup>，后有王蒙在法国宣讲“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进行回应。接着，在2009年北京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等场合，陈晓明又提出“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中国立场”、“中国方法”等看法，遭到肖鹰、张柠等的

<sup>①</sup> 见《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南都周刊》2006年5月20日。

<sup>②</sup> 杨义：《为当今文学洗个脸》，《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3日。

反驳，王蒙、陈晓明被指斥为“唱盛党”<sup>①</sup>。至2010年，《北京文学》第1~6期开辟“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专栏进行讨论，共发文15篇。其持正面肯定观点者为陈晓明、孟繁华和张颐武等，持反面否定观点者为肖鹰、王彬彬和张柠等。其中大多为批评顾彬、肖鹰、王彬彬而声援孟繁华、陈晓明等，即绝大部分支持“唱盛党”和肯定当代文学（当然，在其他报刊发文表示否定观点者还有林贤治等）。此外，在《文艺争鸣》（如2010年第2~4期）和《文艺研究》（如2011年第10期）等刊物上，除陈晓明、孟繁华、张颐武等人继续阐述了他们的观点外，还先后有雷达、於可训、张清华、陈思和、吴俊等人也结合当代文学尤其是新世纪文学谈了他们各自的看法，其中大多持肯定观点而批评“垃圾论”。总的来说，可见出其讨论逐步向冷静、理智、科学的学理层面深化的趋势。<sup>②</sup>

笔者认为，这场讨论对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新世纪文学与学术的健康发展，确有较大的积极意义，而对改变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理论研究的落后状况，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因为，这场讨论的意义不在“结果”而在于“过程”，即在于它所暴露出的问题和它所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我认为，它至少暴露了这样几个发人深省而又具普遍意义的重要问题：第一，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和学风来进行学术批评与研究？是作风浮躁、从“理念”出发、以偏概全，还是求真务实、从“实践”出发、整体把握？第二，我们应站在什么立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在内的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它是否存在所谓“中国立场”与“中国标准”？第三，究竟什么是“文学”？“文学”观念是否需要与时俱进、不断革新？它是否只包括小说等虚构文学而不包括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第四，究竟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学”？它是否应包括至今为止的

<sup>①</sup> 《王蒙、陈晓明为何乐做“唱盛党”？》，西部网（陕西新闻网 <http://www.cnwest.com>），2009年11月26日。

<sup>②</sup> 《北京文学》2010年第6期在《编后语》中总结：“这次讨论在如下几个问题上有所深化：第一，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进入了新历史阶段，必须在新的视野下给予新的理论阐释；第二，‘全球华文文学’概念的浮出水面，改变了我们原有的理解，今后需要在全球化的框架内重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第三，对一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应该重新反思，学术界对‘中国立场’的呼唤必将引起人们的重视；第四，面对当代中国文学新的格局和新的实践，有必要重新确立一整套评价标准。”张清华认为：“近年围绕中国当代文学的争论，其实是普世标准和本土立场之间的错位与龃龉。首先，在国际化的语境与东西方文化关系中，我们一直纠结于中国文学的本土书写与世界意义之间的矛盾；其次，顾彬的‘垃圾’论再次触动了中国文学界的敏感神经，他的观点除了个人的知识盲区以外还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在作怪；第三，立足本土经验的理解是我们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依据；第四，中国当代文学有足够的国际化视野，其人文性与本土性之间具有互相支撑的关系，因此它的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认识。”（《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及评价纷争问题》摘要，《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同期还刊有吴俊《顾彬的意义》一文。）



“新世纪文学”？这些看似普通的常识问题，实际上不但是我们进行“当代文学”讨论而且是进行一切学术争鸣必须明确与解决的前提。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调整心态、明确立场、端正学风、恢复常识，然后才谈得上严肃的“百家争鸣”与理论建设。

首先，关于学风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要郑重提出，是因为它不仅在这场讨论中存在，而且在较长时期的学术研究中存在；不仅在小说等文体研究中存在，而且在有关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评论中也存在。说在学术研究中较长时期存在，是我们时常听到（或读到）有关某某教授、博士等因涉嫌抄袭、剽窃等而被处分、曝光的消息；说在这场讨论中存在，是我们看到：不少非“中国当代文学”专业或读当代文学作品不多、不全的学者，也振振有词、妄下断语；说在有关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评论中也存在，是我们看到：多年以来，也不断有非报告文学研究或读报告文学作品不多、不全的学者断言报告文学已经“死亡”或“灭亡”（见本著后面有关章节）。这就不得不使我们怀疑和思考：为什么提出或支持“垃圾”论与“灭亡”论的大都是非“专业”学者或“圈外”人士？他们的“惊人之语”究竟有多少是建立在全面掌握研究对象的基础之上？其中是否有哗众取宠、恶意炒作的成分？如此，那这样的讨论或争辩又有多少价值和意义？因为，现在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都在千部左右（或以上），即使是专门研究小说的学者，要对该文体的整体状况作一判断都相当困难，何况还有数量相当的长篇纪实文学和其他作品？又何况是包括数十年来诸多文体与复杂现象在内的“当代文学”？试问：面对如此巨大的现实“存在”，非“专业”或“圈外”学者能作出“糟得很”或“好得很”的结论吗？实际上，不论是针对小说而言的“垃圾”论，还是针对报告文学而言的“死亡”论，其论者“一方面是只看到了市场行为的文学，一方面是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他们对“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缺乏了解甚至了解的愿望，特别是缺乏对具体作品阅读的耐心”；因此，“真正有效的批评不是抽象的、没有对象的，它应该是具体的，建立在对大量文学现象、特别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了解基础上的”；<sup>①</sup>“如果我们的批评家根本不去接触和阅读文本，而只是根据媒体上某些浮皮潦草的介绍就对作品说三道四的话，那就耻辱就不是属于作家，而是读者和批评家自己”；如果其批评只是一种“表演性的论战”，那就不过是“游牧人与农夫之间的一种对抗，农夫悉心呵护着他的田园，细数庄稼的收成，自然有喜悦和满足处；而游牧人骑马而来，践踏一番，

<sup>①</sup> 孟繁华：《“憎恨学派”的“眼球批评”——关于当下文学评价的辩论》，《北京文学》2010年第2期。

所见乃是一地狼藉，自然嗤之以鼻”。<sup>①</sup>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的确不应该是空泛的夸夸其谈或“惊人之语”，而是扎实的阅读、研究与理论创新。只有在此基础和前提下，才能进行有效的争鸣与建设。

其次，关于立场与价值标准。我认为，我们不但需要有“中国立场”与“中国标准”，而且需要有“现实立场”与“现实标准”。就前者而言，为什么我们的文学研究往往需要外国人的“干预”才会引起重视或加以关注？新时期初，由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等的影响，我们才将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重写”进现代文学史，难道现在我们又要因顾彬的“垃圾”论而“重写”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是要不断“重写”，但并不能因“垃圾”论而“重写”）？为什么“洋人”的“垃圾”论一出即引起强烈反响甚至随声附和，而“国人”一再提报告文学“死亡”论却反响甚微甚至“沉默是金”？在这里，除了传统观念与文体偏见之外，难道不存在“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偏见？如要说对报告文学现状不了解、缺乏发言权，那现在有许多人同样对“当代文学”不了解（或了解甚少）不也在发言吗？实际上，顾彬所说不但只是“一家之言”，而且不是严格的学理论述而只是一般的“有感而发”，我们最多是“洗耳恭听”而不必当做“金科玉律”。因为，即使“垃圾”论是严谨的学术论断，即使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了解较深透，那也有个立场与价值问题。即他毕竟是站在西方（德国）的立场上用西方（德国）的标准来看事物与谈问题的——虽说我们现在强调“全球化”，也确有所谓真善美与人道主义之类的共通标准，但难道就没有我们的“中国特色”与“民族标准”？譬如：他对我国“沉重”、“忧患”的现当代历史，有我们国人的切肤之痛与感受之深吗？对我国的国情现状与现代化追求，有我们国人那样的了解深透与焦虑、期盼吗？尤其是，他对新时期至今的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创作了解吗？如果他较全面、系统地把握了“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整体，他还会有关于“垃圾”之说吗？总之，正如有人所说，“简单地追求国际承认的心态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应该反对的，强调学术研究立足于本土发展、关注与解决本土重大问题、能够激励本土学术发展，应该是我国学术评价的基本原则”<sup>②</sup>；“评价中国文学应该以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社会价值的评价立场，而不应该盲目地拿西方的观点来评价中国文学”；“好文学劣文学能够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学就是好文学。搞好文学评价也要‘因地制宜’，中国的国情就决定了中国文学，既然是中

<sup>①</sup> 张清华：《人文主义与本土经验——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从肖鹰对陈晓明的批评谈起》，《文艺争鸣》2010年2月号。

<sup>②</sup> 草红霞：《过度强调SSCI评价功能不利学术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12日。



国特色的文学，就应该用中国立场来评论”。<sup>①</sup>

当然，说到这里，就不只是“中国立场”与“中国标准”问题，还有个“现实标准”与观念更新的问题，即牵涉到“什么是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是否应包括“新世纪文学”的问题。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观念更新问题，我准备在下面再展开辨析，这里须着重指出的是：包括顾彬在内，这场论争中的不少学者——尤其是赞同“垃圾”论者，他们心目中的“当代文学”不仅未包括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而且未包括“新世纪文学”：前者是因观念陈旧而未将报告文学等视为“文学”或至少未视为正统“文学”；后者是因阅读与视野所限而未顾及“新世纪文学”。实际上，如果将这两个缺陷弥补，得出的可能是另一结论，或者说，结论不争自明。因为，本著的创新与优长之一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即一是革新观念，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将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视为与虚构文学同等重要的正统文学；二是拓宽视野，立足前沿，将至今为止的“新世纪文学”视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系统考察。这也是笔者所说的“现实标准”，即根据“至今为止”最新、最好的创作，考察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与趋势，并发掘其理论新质与最新启示，而“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如此，笔者至少依据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半壁江山”而可得出结论：中国当代文学不但不是“垃圾”，而且与“唱盛党”一样，认为目前中国文学的确处于“最好时期”，也的确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点，本著分别从发展论与流派论等方面，对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成就与发展等进行了较系统、全面的论述；同时，也对从实践中总结、提升出的理论新质进行了概括、归纳与具体辨析。如从发展论的角度考察，笔者认为，中国报告文学在观念、性质方面，完成了“从‘旧三性’到‘新五性’”的根本变革；在文体发展方面，经历了几次“从冲突到融合”的否定之否定；在作家思维方面，经历了“从两极到中介”的重要革命；在形式风格方面，也经历了“从一体到多元”的深刻变化。从流派论的角度考察，笔者认为，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形成了八个流派或“准”流派，它们一般都呈现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如“哥德巴赫”派继新时期初以徐迟、黄宗英、陈祖芬等为代表的第一次高潮后，20世纪90年代后又出现了以李鸣生、徐剑、何建明和王宏甲等为代表，持续发展、规模更大的第二次高潮；“社会问题”派表面看来，似乎20世纪80年代是最繁荣的巅峰期，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1世纪以来，以胡平等作家的“学术体”和《中国农民调查》、《第一种危险——张金柱恶性交通肇事案真相调查》（以下简称《第一种危险》）

<sup>①</sup> 张新安：《中国的事该由自己办——要有“中国立场”毋庸置疑》，《北京文学》2010年第4期。

和《中国新教育风暴》等创作为代表，它更进入了沉稳、健康、综合发展的新阶段；“人杰宣传派”也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还只有穆青等少数人的少量短篇，而自90年代以来，则不但涌现了以何建明、邢军纪、寒青和郝敬堂等为代表的大批作家，而且还涌现了《魂系青山》、《血情》、《雪山之子》、《特别关注：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关于和平时期死难烈士家人们的报告》（以下简称《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大爱无言——追记“和平卫士”郁建兴》（以下简称《大爱无言》）、《为了拯救生命——4万：400万的牵挂》（以下简称《为了拯救生命》）和《善良，让她如此美丽》等大量优秀作品；尤其是“历史反思”派，20世纪80年代还只有黄济人、胡平、大鹰和董汉河等人的少数作品，而自90年代至今，则随着纪实文学思潮的持续升温，它不但成就了叶永烈、权延赤、邓贤、张正隆、张建伟、冷梦、王树增、彭荆风、郝在今和曾凡华等大批专业作家，而且还涌现了《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等大型丛书系列和《8·23炮击金门》、《上海1949》、《中国海军三部曲》、《解放大西南》与《雪冷血热》（上下卷）等大批重型长篇。至于“国土热流”派、“生态环保”派与“巾帼红颜”派等也是如此：也基本上呈现出数量由少到多、篇幅由短到长且形式、风格更趋成熟、多样的态势。

总之，无论从观念变革与整体发展还是从思潮流派与作家作品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也的确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确处于发展的“最好时期”。如果说，王蒙、陈晓明和孟繁华等主要是从小说等虚构文学方面所得出的结论，那么，笔者则从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角度也对此进行补充和呼应。如关于“最好时期”之说，笔者认同的理由是：新时期以来的这30年，既没有五四以来第一个30年的“救亡压倒启蒙”，也没有第二个30年中的“文革”动乱与极左政治干扰，因而不存在沈从文等人的“改行”与大批“右派”作家的被耽误20多年等，而基本上是从“思想解放”到“和谐建设”的稳步发展。这也是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学”能够自我超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重要原因。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陈思和的论述为证。他认为：“现代文学史上大器晚成的作家不多，晚年奉献出扛鼎之作的也不多，都是在各领风骚十来年的循环下自然被淘汰。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常态文学不一样，文坛风气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这就为当代作家提供了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作家们在各个时期都可以写出有影响力的作品。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张炜、韩少功、林白、阎连科、张承志、苏童、余华、李锐等等，这一代作家的幸运，就在于当他们以先锋姿态走上文坛以后，当代文学在市场经济刺激下转型为常态了，去工具化的当

